

政策与实践：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的考察(1949—1965)

○ 王艳 史博公

摘要：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局与拓展（1949—1957）。二、跃进与挫折（1958—1960）。三、调整与推广（1961—1965）。在此过程中，相关政策与实践的推行有成就也有教训，但总体效益应予肯定——既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也把国家意志传播到了广大农村。这些经验对于当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显然具有多重镜鉴价值。

关键词：新中国 农村电影放映 政策与实践 中国电影社会学

通过普及农村电影放映，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农业集体化生产——这是新中国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采用“中国电影社会学”^[1]的研究方法，纵向考察了相关政策和实践的沿革状况（1949—1965），扼要分析了农村电影放映的运行机制和效果，客观评价了这项事业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效益，进而探讨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开局与拓展（1949—1957）

新中国历来重视电影的教化功能。早在1949年

12月，文化部电影局就决定“大量扩充放映队，组成全国部队、工厂、农村的放映网”^[2]，以便广大群众能通过电影接受新思想、树立新观念，从而确立对新政权的信仰。为此，电影局于1950年6月开始在南京举办“放映人员训练班”，共培训学员1800多名。各地以这批学员为骨干，陆续组建了600支放映队。^[3]随后，电影局又决定1951年要在“全国建立700—800个电影放映队”^[4]。此外，文化部电影局还针对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的管理问题推出多项政策^[5]，并协调各地政府在北京创办了“中央电影局电影洗印厂”^[6]，在哈尔滨、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若干电影机械厂。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组建起放映队伍，开始致力于城乡放映网的建设。

王艳，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史博公，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仅就这一阶段农村放映的发展情形而言,成就最突出者当属东北地区。其中,吉林省于1950年9月成立放映队5个,结束了该省“没有农村放映队的历史”^[7]。辽东省于1951年1月组建放映队9个^[8],当年就让25个县的农民看上了电影(全省有29个县)。到1951年底,东北地区已有农村放映队49个,全年放映3704场,观众达6,445,764人次。^[9]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农村放映亦有初步发展。譬如,在一篇题为《老乡们渴望着人民电影》的文章中,不仅介绍了山东及西北五省的相关情况,还指出电影对“乡村广大劳动人民,起了十足的启发阶级觉悟的效果”^[10]。对此,文化部在1952年的一则通报中给予了充分肯定——“查全国各文教系统自从成立巡回电影队深入广大农村放映以来,对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等运动都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热爱,证明人民电影已成为农村中的一支有力的宣传教育武器,各地农民要求大量增加电影放映队”^[11]。

上述史料表明,农村电影放映很受欢迎,在宣传国家战略部署方面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农村放映队伍数量太少,远远无法满足基层需求。为此,中央于1955年底调整了电影放映管理体制,开始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培训放映人才。^[12]此举得到各地积极响应,典型如吉林省不仅在1955年开设了“电影放映干部训练班”,还在1956年将其升格为“吉林省电影放映学校”(中专),让人才培养走向规范化和持续化。^[13]又如,浙江省采用固定校舍和师资定期培训学员(含发电、放映、扩音等专业),使全省农村放映队很快就由1953年的101个,增至1956年的209个。^[14]此外,江西、山西等地也培训了不少放映员。^[15]到1957年底,全国县均放映队已有2.6个,农村观影人次则由1952年的0.42次,提高至1.5次。^[16]

为激励基层放映队的工作积极性,文化部电影局还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针对农村放映的运营机制和管理模式,推出了一系列务实政策。譬如,为稳定农村放映队伍,特意将部分放映队纳入县级国企编制;允许放映队进行企业化经营;收费可采取售票和包场两种方式;票价一般按最低标准(5分)收取,但亦可

按具体情况自主决定;排片可根据当地观众差异灵活处置。^[17]

在农村放映活动的组织和片目选择上,文化部电影局尤为注重利用农闲时节向广大农民传播中央精神。例如在1953年12月,文化部电影局就以宣传国家总路线为主题,推荐了《葡萄熟了的时候》(1953)、《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农村生产合作社》(1953)、《民间歌舞》(1953)等国产影片,以及《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Valgus Koordis, 1951)、《走向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等苏联片。在1956年春节期间,又将放映主题定为“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宣传”^[18]。为此,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还特意选择了一些适于农村发行的影片,如故事片《夏天的故事》(1955)、《水乡的春天》(1955)、《平原游击队》(1955),纪录短片《老社帮助新社》(1955)、《农业合作化高潮》(1955)、农业科教片《白天黑夜》、《防治棉蚜》,动画片《一朵小红花》(Аленький цветочек, 1952)、《刘氏三兄弟》(Братья Лю, 1953)等。^[19]

由于政策务实、针对性强,尊重农民的观影需求,所以这一阶段的农村放映广受欢迎。到1957年,各地观影人数已有大幅增长。以江苏省部分乡镇为例,海安县清平乡有70%的人看过电影;江都县新光合作社有50%的社员常看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全家锁了门去看”。还有些地方因缺乏“有围墙的放映场地,不能成立放映点,群众就自动地打起土墙来争取”^[20]。可见,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历经数年奋斗,已由最初的政府行为逐步变成民间需求。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看电影”已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新风尚。

回顾1949年至1957年间的农村电影放映政策及落实情况,大体可概括为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显著——各地县级放映队普遍建立,农民观影人次逐年提升。这些成就主要源于以下因素:一是各级政府多次举办培训活动,为农村放映训练了人才队伍。二是新中国工业的发展,为农村放映提供了基本装备。^[21]三是诸多农村题材影片的面世,保障了农村放映的内容需求,如《白毛女》(1951)、《农家乐》(1950)、《儿女亲事》(1950)、《结婚》(1954)、《刘巧儿》(1956)、

《洞箫横吹》(1957)等。

当然，推动农村放映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央重视。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建立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换言之，动员农民投身革命正是马列主义本土化的精髓所在。而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同样离不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理解和投入。为此，就需要运用电影这种既便捷有效又通俗易懂的媒介及时向农民宣传国家意志。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才有了诸多农村电影放映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在教化农民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譬如，《白毛女》促进了土改运动；《儿女亲事》宣传了新婚姻法；《洞箫横吹》赞美了农业合作化……^[22]这些影片通过善与恶、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戏剧化对比，为农民观众描绘了一幅幅如何挣脱苦难、奔向幸福的生动画卷，由此引导他们确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成为新社会的坚定拥护者和建设者。

农村电影放映不仅在内地取得明显效益，即便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也同样不乏功效。例如，在解放初仍处于奴隶社会的云南临沧地区，各族群众就是通过电影“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感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23]。又如在1956年8月，西藏自治区政府曾动员藏民送孩子到内地学习，不料他们听信谣言，“不敢把孩子送出去”。但在看过影片《祖国的花朵》(1955)后，藏民们纷纷表示：“上了敌人的当了，看内地的孩子们多幸福啊！”结果在影片放映次日，“就有十多个藏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内地去学习”^[24]。

二、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跃进与挫折（1958—1960）

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开局良好，在最初七年里发展得很顺利。遗憾的是在进入1958年后，全国掀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运动，“浮夸风”遍及各个行业^[25]，在电影放映政策和实践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现象。当年3月，文化部要求各地“迅速掀起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全面大跃进”，并将全国放映场次

和观众人次的“跃进目标”由1957年的260万场、20多亿人次，骤然提高至1958年的400万场、30亿人次。^[26]到1960年3月，文化部又要求“大战1960年，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700万场，55亿观众人次的光荣任务”^[27]。这些数据表明，文化部试图让全国放映规模在三年内增长两三倍，观影人次要年均增长十多亿。在此过程中，尽管各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际业绩也有所增长，但因其背离了行业发展规律，最终并未达成既定目标。

具体到农村电影放映的情况看，文化部为实现节节攀升的跃进目标，首先将管理权限大量下放基层。譬如，电影发行由统购统销改为统购分销；电影票价和片租一律由各地自行规定。^[28]对此，多地在执行中都采取了更为豪放的措施。其中，辽宁省在1959年5月索性“将16毫米影片发行工作下交县镇”^[29]。此外，文化部为“加速电影放映单位，特别是农村放映队的发展”，还要求各地“从1958年起，以十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县有影院，乡有电影放映队的水平……资金由集体筹集，人员由生产队抽调，经营方式按企业管理，进行收费放映，费用由放映收入解决，社办社管，乡办乡管”^[30]。到1960年，文化部更进一步号召各地要“大鼓干劲，向农村进军，全面大跃进”^[31]。

仔细审视这一阶段的农村电影放映政策不难发现，尽管那些计划、目标和口号相当豪迈，但因其严重脱离国情，漠视农民的消费能力和习惯，所以大都没有可操作性。尽管如此，各地在上级日益高企的指标驱使下，依然掀起了发展民办放映队的热潮。在1958年的五一劳动节，河北省沙河县万户社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民自办放映队，随后昌黎、遵化等县迅速跟进。河南省计划在通电的农村重点发展民办放映队。湖北省规划了55个农村放映队，其中有40个民办队。湖南省打算办40个放映队，完全由民办的占三分之二左右。^[32]仅从当时的统计数字看，全国农村放映队的增速极为惊人——1957年有6692个，到1960年竟飙升至11151个，增幅达67%。^[33]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均为人民公社自办的放映队，而这些“放映队”既无设备也无人才，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在层层加码、相互攀比的时代氛围中，各地农村

的放映目标和业绩不断刷新“放卫星”的高度——“有的放映队提出年放电影一千场、两千场，并出现了‘通宵场’‘鸡叫场’”等现象。^[34]在1960年春节期间，河北省徐水县为“吸收更多的观众……经过三十、初一、初二三昼夜的艰苦奋战，全县六个队共映出128场（正64、副64），吸收观众达7,0273人次，活动了35个放映点，使80个村的广大社员看到了声光俱佳的电影”^[35]。同样是在1960年，湖南省甚至“提出要大力普及放映，农村放映队（包括社办队）全年平均每队活动300—320个工作日，放映650场（长片400场，短片250场）”。湖北省阳新县则表示“要让银幕挂遍山头湖边，叫电影歌声响遍全县城乡，保证38万人民平均看到10次以上电影”^[36]。

即便在偏远山区，相关数据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增长。有资料记载，截至1960年底，广西大瑶山“放映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观众增加36%”。西藏的放映单位增至99个，全区每县都有一个放映队，近一年半来共放映17494场，观众达一千余万人次……^[37-38]

如果仅凭上述这些来自当时官方文件或报刊的数据，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地农村不到三年就涌现了大批放映队，放映场所和场次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受设备和人才普遍缺乏等因素的制约，许多民办放映队都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因而这些见诸史料的数据并不可靠。即便是对于那些具备放映条件的农村而言，实际观影人次与上报数据相比也有极大差距，那些惊人的数据多是用“鸡叫场”等方式臆造的结果。^[39]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曾发生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许多乡村连口粮都难以为继，遑论其他。^[40-41]若此，上述数据的真实性便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中央电影主管部门对各地的实际状况也有所察觉。在1960年12月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指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相适应，某些方面走过了头，比较注意数量，不重视质量，思想方法上有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42]。这表明，包括农村电影放映在内的相关工作普遍存在浮夸现象。

显然，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在“大跃进”期间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尽管聚焦于此的专论尚未面世，但许多史料都从侧面佐证了问题的严重性。譬如在1961年，辽宁省曾两次发文强调“电影队应根据‘农闲多映，农忙少映，大忙不映’的要求”，“缩短每场放映时间和严格控制晚场散场时间，以保证广大观众在享受文化娱乐同时，有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精力充沛地搞好生产和工作。晚场冬季至10点，夏季到10点45分，每场不得超过120分钟”^[43]。可见，有些地区对放映场次的过度追求，已对农民休息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干扰，这显然不利于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正常发展。

三、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调整与推广（1961—1965）

为妥善处理“大跃进”期间出现的诸多问题，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结束，中央开始提倡务实发展。^[44]以此为契机，文化部迅速对农村电影放映政策作了大幅调整。例如，在《关于1961年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各地应“加强农村放映队的维修配套工作，保证经常出勤，对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对敌斗争地区，要填平补齐，逐步达到布局合理”^[45]。这表明，当时因缺乏配套设备和人才，全国农村放映仍有不少空白。针对这类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文化部于1962年果断发出《关于收回公社电影放映队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政策上杜绝了虚张声势的做法。由此，过去因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所造成的问题得以逐步解决。

在大幅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中央还对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给予了切实支持。譬如，文化部在1963年“为加强电影为农民服务的工作，除积极组织力量创作和摄制适合农民需要的影片、改进供应农村的影片节目以外，还增加了发行到农村的影片拷贝的供应数量，力求使广大农民能够普遍地看到电影”^[46]。1965年，中央再次强调要加强农村发行放映工作，解决农民长期看不到电影的问题，将供应农村的节目当作工

作重点安排。^[47]对此，文化部协同财政部及时发布了相应政策予以鼎力支持。例如，暂予免征农村放映队的文化娱乐税；降低在农村放映电影的收费标准；在农村放映的科教片一律免收片租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农民看电影的人次有了明显增长。^[48]

通过连续几年的努力，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截至1965年底，全国农村放映队达到9835个^[49]，推行规划放映的县由1964年的60多个上升到近1000个^[50]。此外，在不具备放映电影条件的农村则采用了放映幻灯片的形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也有扩展。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立农村放映点1100多个，农民每年能看到5—10部影片。新疆在每个县都建了影院，另有近400个流动放映队常年为农牧民服务。^[51]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的影片主要用汉语普通话发音，而偏远地区的人们大都听不懂普通话，所以有些放映队就用方言进行现场解说或配音。其中，吉林延边放映队做得尤为出色。他们努力体会不同人物的语音、语调、语气，“力求做到‘学男像男，学女像女，老少有别，好坏分明’”。结果朝鲜族观众不仅表示“听懂了……受到了教育”，甚而还以为这是“已经译制好的朝鲜语影片”^[52]。据统计，全国截至“1965年底，实行影片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语言配音的放映队，达到460多个，可使将近4000万群众看到本民族或本地区语言的影片”^[53]。实践证明，这类创造性劳动的确增强了电影的宣传功效。

随着农村电影放映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它在传播国家意志、更新农民观念、促进农村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显著。典型如湖南省平江县长庆公社的社员，他们起初接触电影只是抱着“看新鲜，看热闹”的态度，但在看过《农奴》（1963）、《夺印》（1963）、《李双双》（1962）、《槐树庄》（1962）、《董存瑞》（1955）等十多部片子之后，不仅对红色历史和革命的意义有了感性认知，而且还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很多电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鼓舞大家前进的力量”。在看过“革命电影”后就“对那些封建、色情的戏曲都不感兴趣了”^[54]。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更有这样的表述：“电

影队下乡放映《儿女亲事》后，群众比较深刻地认识了婚姻自主的好处，许多父母改变了包办儿女亲事的封建思想。”^[55]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农村电影放映在推广农业科技、促进农业生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山西稷山县城关公社的社员在“看了《小麦选种》影片以后，大大增强了繁育良种的信心”。看了《冷冻消灭棉花红铃虫》《彻底消灭棉花病虫害》后，将棉花亩产量提高了31.5斤。宁夏西吉县在广泛放映《水土保持》后，全县人民立即投入了相关工作。湖北省沙洲县在放映《精选稻种夺丰收》后，农民们纷纷表示“对自己生产队选择良种建立种子田帮助很大”^[56]。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力度较大，成效也很显著。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关键在于中央遏制了以往的冒进行为，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政策，在改善运营模式的同时还加大了财政投入，从而让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出现了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文化部在年度总结中认为，“1965年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是突出政治、突出农村……取得成绩比较显著的一年”^[57]。在当年12月举行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文化部强调1966年“要进一步加强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五亿农民服务的工作”，并且要把面向农村的放映作为首要任务。^[58]遗憾的是，此后受多种因素困扰，相关工作未能得以持续。

结语

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值得深入探讨，其间所取得的成就殊为可贵，所经历的曲折也给后世留下诸多教益。这些历史经验对于目前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无疑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镜鉴价值。

首先，新中国的文化实践证明，农村电影放映是教化农民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无疑应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正所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59]。而努力促进包括电影放映在内的乡村文化建设，并将其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无疑是“铸魂”之关键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由政府推行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已取得显著效益。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数字院线已增至333条，数字播放服务器接近50000套，地面卫星接收中心站多达270个，订购影片近6500部，观影人次超200亿。^[60]目前，这一举措仍在各地深入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享受农村电影放映的发展成果。

其次，农村电影放映涉及面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决不能好大喜功、盲目冒进，必须秉持稳步渐进的原则方可奏效。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确立命题、应对问题、化解难题等方面，要依据国情民意顺势而为。譬如，怎样协调政策规划与实践落地的问题；如何统筹乡村公益放映与城镇院线经营的矛盾；怎么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放映问题，

以及如何满足不同区域农村放映的个性化需求等。

好在国家电影局对上述问题很重视，已经采取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措施。此外，在《“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电影局不仅确立了“升级电影公共服务”的发展目标，还计划从“优化布局结构、提升服务效能、加强管理服务”等方面，着力“推动城乡电影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力求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61]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力“十四五”规划的东风，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必将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注：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山西农村电影放映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CZS080）、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电影社会学导论”（项目编号：CUC210A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谢阳）

注释：

- [1] “中国电影社会学”重在探讨中国电影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理论本土化探索的重要成果。参见史博公·建构中国电影社会学[J].电影文学，2017（9）。
- [2]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
- [3] 参见张伟·新中国电影放映事业的摇篮——南京电影放映训练班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5）。
- [4] 参见文化部一九五〇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A].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1982：10。
- [5] 参见文化部一九五〇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A].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1982：82-84。
- [6] 参见何永庆，南柏芳·峥嵘岁月——纪念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建厂五十周年[J].影视技术，2000（12）。
- [7] 陈焕主编·吉林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07—1992）[G].长春：吉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94：37-40。
- [8] 辽东省设于1949年，省会在安阳市（今丹东市）。1954年与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小部分划归吉林省。
- [9] 参见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辽宁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06—1994）[G].沈阳：辽宁省电

- 影发行放映公司，1994：104-120。
- [10] 参见佚名·老乡们渴望着人民电影[J].新电影，1950（4）。
- [11]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3。
- [12]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J].电影艺术译丛，1954（1）。
- [13] 参见陈焕主编·吉林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07—1992）[G].长春：吉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94：57-74。
- [14] 参见浙江省文化厅电影处，浙江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浙江分会编·浙江省电影事业大事记（1949—1986）（初稿）[G].杭州：浙江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88：8-23。
- [15] 参见向晴·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各地培养放映人员[J].大众电影，1953（4）。
- [16] 参见文化部关于今后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改进体制下放干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A].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1982：59。
- [17] 参见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40。
- [18] 参见文化部关于开展春节农村文艺活动向农民宣传国家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A].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

- 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1982:259.
- [19] 参见佚名.电影放映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宣传[J].大众电影,1956(2).
- [20] 参见周鉴铭.农村影片供应的矛盾[J].电影放映,1957(5).
- [21] 对此,文化部在《关于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总结》中指出,“五年来我国电影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包括影片生产、大量拷贝洗印、电影发行放映网、电影机械工业、电影器材供应与修理”。详见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31-432.
- [22] 参见胡家翀.意识形态下集体主义的书写——以“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为例(1949—1966)[J].电影文学,2017(21).
- [23] 参见童应钦.奴隶社会的少数民族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J].电影放映,1957(4).
- [24] 参见姜富章.打消了藏民的思想顾虑[J].电影放映,1957(4).
- [25]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473-500.
- [26] 参见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83-184.
- [27]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6.
- [28] 参见文化部关于进一步改进文化工作管理体制向中央的请示报告[A].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G].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1982:65-68.
- [29] 参见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辽宁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06—1994)[G].沈阳: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94:175-181.
- [30] 参见佚名.关于试办农业合作社自办电影放映队的通知[J].电影放映,1958(6).
- [31] 参见佚名.大鼓干劲 向农村进军 全面大跃进——文化部召开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J].电影放映,1960(6).
- [32] 参见佚名.依靠群众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网[J].电影放映,1958(5).
- [33] 参见佚名.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跃进[J].电影放映,1960(1).
- [34]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4.
- [35] 参见佚名.跃进后浪超前浪放映战线喜迎春[J].电影放映,1960(1).
- [36] 参见佚名.倡议书一声春雷响 各地响应风起云涌[J].电影放映,1960(6).
- [37] 参见佚名.不怕山高路远 把银幕挂遍大瑶山——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大瑶山电影队[J].大众电影,1960(13).
- [38] 参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J].人民日报,1961(4).
- [39] 参见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2.
- [40] 参见汤兆云.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饥荒与农村人口的关系[J].江苏大学学报,2010(3).
- [41] 参见吴跃农.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竭力解决粮食问题[J].文史精华,2020(19).
- [42]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
- [43] 参见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编.辽宁电影发行放映纪事(1906—1994)[G].沈阳:辽宁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94:184-185.
- [44] 参见柳森.1961—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J].北京党史,2010(1).
- [45]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
- [46] 新华社消息.文化部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作[N].人民日报,1963-04-12.
- [47] 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积极发展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N].人民日报,1965-01-12.
- [48] 参见柳迪善.20世纪50—80年代农民的观影权利[J].电影艺术,2020(3).
- [49] 参见马石骏.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回顾与展望[A].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36.
- [50] 参见佚名.突出政治 突出农村 突出革命化——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电影放映,1966(1、2).
- [51] 参见1964年9月30日《吉林日报》和1965年9月8日《新疆日报》相关报道内容,转引自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全国报刊电影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493.
- [52] 参见金东赞,崔永福.从事对白解说工作的点滴体会[J].电影放映,1965(1).
- [53] 参见佚名.突出政治 突出农村 突出革命化——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电影放映,1966(1、2).
- [54] 参见李远源,李寒波.革命电影人人爱[J].电影放映,1965(6).
- [55] 参见佚名.电影放映队活跃在工厂、农村和朝鲜前线——读者来信综述[N].人民日报,1952-10-17(2).
- [56] 参见佚名.工农群众喜爱科教电影[J].电影放映,1965(4、5).
- [57] 参见关于大力开展电影普及放映 紧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J].电影放映,1964(2).
- [58]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0.
- [59] 骆郁廷,刘彦东.以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N].光明日报,2018-05-08(版次不详).
- [60] 参见佚名.2019年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盘点[EB/OL].<https://www.dianyingjie.com/2020/0219/44670.shtml>,2020-02-19.
- [61] 佚名.“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N].中国电影报,2021-11-17(2).